

438270

23819
6062

评《吕氏春秋》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江苏人民出版社

819
162

309

评《吕氏春秋》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高邮县印刷厂印刷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100·050 每册 0.08 元

目 录

评《吕氏春秋》.....罗思鼎 (1)

吕不韦尊孔反法阴谋篡权复辟的失败.....施达青 (13)

吕不韦的反动一生.....晋海生 李业平 俞景玮 (27)

《吕氏春秋》

罗雄鼎

秦统一六国前夕，秦始皇与吕不韦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吕不韦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商人、大政客，招集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为他在秦国复辟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段历史受到了颠倒和歪曲。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被说成是社会进步的代表，而秦始皇却反而受到了贬斥和指责。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把这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的真相弄清楚，并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

吕不韦何许人也？他是个“家累千金”、奔走于秦、赵等国的大商人，也是一个“家僮万人”的大奴隶主。凭着雄厚的财势和赌徒的手腕，他在秦国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下，把一个原来流落在赵国当人质的公子异人送回秦国当上了秦庄襄王，他自己也因此当上了丞相。庄襄王死后，十三岁的秦始皇继位，秦国的大权就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政治投机的成功，是秦国国内外奴隶主复辟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反映了当时工商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联合起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

的动向。

《吕氏春秋》的出笼在秦始皇八年，当时正是吕不韦不可一世的时候。这部反动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什么叫“兴灭国”？就是要把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扶植起来，恢复西周时期诸侯林立、各霸一方的状态。在当时，这是一条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反动道路。吕不韦从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造谣惑众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审分览·慎势》）他居然认为国家越是分裂，传世就越长久，名声就越响亮；所谓“神农氏”传了十七世，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竟被说成是因为能够与大小奴隶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缘故。吕不韦用这种杜撰的理论，竭力反对统一，提倡维持当时各国割据的局面，鼓吹“存亡继绝之义”决不可废（《审应览》）。他把已经灭亡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这种反动政治主张的具体实施。

战国末期，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的推动下，全中国范围内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秦国处在这个潮流的最前头。孔丘七世孙儒生子顺在当时就发出了“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的哀鸣（《孔丛子·执节》）。秦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分裂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以达到全中国的统一。吕不韦妄想保持当时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甚至要求恢复奴隶主的分封制度，这是历史的反动。

什么叫“继绝世”？就是要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

重新扶植起来。在封建制已取代了奴隶制的秦国，这就是反对进步、提倡倒退。坚持还是反对“继绝世”，在当时表现为儒家两家的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孟子这一派厚古薄今，主张法先王，崇拜夏、商、周，妄图复辟奴隶制。荀子这一派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引导人们向前看。这两派是当时对立的两大阵营。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属于荀子的一派，他拥护秦始皇，赞成在秦国行之有效的法家政策，坚信秦始皇的封建统一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吕不韦的立场与李斯完全相反，属于孟子一派。他反对秦始皇，对秦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没有半点看得上眼。一翻开《吕氏春秋》，到处充满着“今不如昔”的论调，什么“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啊（《有始览·听言》），什么“当今之时，世闇甚矣”（《开春论·期贤》）。总之，在吕不韦的眼睛里，天下一团漆黑，糟糕透了。原因呢？吕不韦认为这是由于周朝奴隶制受到了破坏的结果，而要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的奴隶制时代去。他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有始览·谨听》）

吕不韦所崇拜的周天子，是一个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奴隶主贵族的最高头子。吕不韦要把已经“绝世”的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就是妄想造成社会的大倒退。吕不韦所说的“强者胜弱，众者暴寡”，实际上是指新兴地主阶级战胜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封建制一边的众人镇压了孤立的反动奴隶主。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一个进步的阶级推翻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暴烈的革命行动，

决不能搞什么温良恭俭让。吕不韦发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诅咒，正暴露了他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立场。

什么叫“举逸民”？就是要让被打倒了的奴隶主阶级重新上台。吕不韦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孟春纪·贵公》）其实，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即所谓“天下”是有阶级内容的，只有某一个阶级专政的“天下”，而决没有代表包括敌对阶级双方利益的“公天下”。各个阶级所讲的“公”，从来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公”，包括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决不包括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吕不韦所说的“公”，是奴隶主阶级的“公”，是为了谋取奴隶主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他鼓吹“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孟春纪·去私》），就彻底地暴露了他那反动奴隶主的丑恶嘴脸。他对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即所谓“贤者”，是“封”，是裂土分爵，全力扶植；对于新兴地主阶级即所谓“暴”民，是“诛”，是斩尽杀绝，寸草不留。爱憎是何等分明！什么“公则天下平”，完全是骗人的假话。

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争论，归根到底，是一场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吕不韦叫嚣复古倒退，咒骂“今不如昔”，目的是为了在秦国贯彻执行反动的儒家的政治路线，变地主阶级专政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法家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咒骂法家商鞅忘义而趋利，是无信的小人；诬蔑法家吴起是个自大狂，最后不得好死。他还

强调治理天下要用儒家的“德”和“义”，不能用法家的“严罚厚赏”这套办法，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至于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在吕不韦的眼中完全是一个了不起的“圣人”。他吹捧孔丘在鲁国执政三年，鲁国男女分途，路不拾遗，谁也比不上他的政治才能。他同情孔丘官运不亨通，在当时没有得到重用，以致造成了周天子的垮台和天下的大乱。他还完全重复孔丘那套陈词滥调，说什么“圣人用德要求自己，天下四面八方的人就都会归顺于仁了”（“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季秋纪·精通》）。这实际上是“克己复礼”的翻版。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期间，为了推行《吕氏春秋》所提出的这条反动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大力扶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势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分裂活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秦国形成了以宦官嫪毐为首的新奴隶主集团。嫪毐在公元前二三九年被封为长信侯，拥有大量领地、宫室和奴隶，在当时权势很大。秦国的大小官吏一见面就相互询问：“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秦国的政治局面一度落在吕氏和嫪氏奴隶主集团的控制之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封建制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秦国掀起复辟逆流的吕不韦和嫪毐，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秦始皇决心沿着法家的道路，把秦国这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事业进行到底。吕、嫪奴隶主集团的党羽遍布朝野，权倾公卿，他毫无惧色。面对吕不韦发出的所谓“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的恫吓（《似顺

论》），他也不动摇。他尽管遭到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极端嫉视和百般咒骂，仍然放手任用法家李斯为客卿，坚定地执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因此，秦始皇二十一岁刚亲政，嫪毐集团就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奴隶主的武装政变。然而，这场叛乱很快就被秦始皇镇压下去了。揪出了嫪毐，也就暴露并孤立了吕不韦。吕不韦于次年罢官，两年后畏罪自杀。秦始皇的一连串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为秦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封建地主阶级在当时是真老虎，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秦始皇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藐视和打倒那些庞然大物，不愧是在全中国第一个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吕、嫪集团在秦国十余年惨淡经营，根深蒂固，为什么会顷刻瓦解、一朝覆亡呢？这是因为当时人心所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前进不要倒退。秦始皇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这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和孔老二、吕不韦一样，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一条搞复辟、倒退和分裂的路线。他诬蔑秦始皇是“暴君”，咒骂法家是“罚家”，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伟大成果，诽谤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妄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制造分裂，到处封官许愿，培植死党，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自以为比磐石还要巩固。但事实上上一触即溃，一冲就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沿着社

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不是已经将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抛向一旁了吗？

(二)

《吕氏春秋》号称《春秋》的续篇，二者是既相同又不相同。孔丘修《春秋》，通过对历史的褒贬笔削，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以达到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在这一点上，《吕氏春秋》与《春秋》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就很不同了。孔丘在《春秋》中树起了儒家的黑旗，露骨地鼓吹复辟、倒退。《吕氏春秋》要狡猾和隐蔽得多。它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动思潮。

《吕氏春秋》所以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是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孔丘修《春秋》的时候，封建制还刚刚兴起，鲁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还比较强大，所以敢于公开宣布他的复辟理论。到了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时候，随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秦国又是法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一直奉行着法家的政治路线，儒家的名声很臭。在这种形势下，吕不韦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只能搞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这标志着当时秦国地主阶级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奴隶主阶级，标志着吕不韦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彻底没落和反动。

《吕氏春秋》的这种折衷主义的特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

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当时由于发生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各种思潮和学派，相互攻击，各不相下，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的反映了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争论，如柳下跖对孔丘和儒家的批判。有的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争论，如儒家和道家的争论。有的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争论，如儒家和法家、名家的争论。到了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入了最后决战的关头，斗争的日益激化使阶级阵线渐趋明朗，各家的混战局面为儒法两家鲜明的对垒所代替，并出现了名家归于法家的新情况。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双方，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各自力图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状况进行总结。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敢于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对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各家学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韩非的《五蠹》篇就是这样一篇杰出的代表作。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在奴隶制彻底崩溃的局势面前，不敢正面摆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的态度，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旗子来掩护对法家的反扑。《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一部典型作品。它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作了总结。

杂家从来不杂。“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吕氏春秋》的本质是宣扬反动的孔学，这一点已在前面说明了。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吕氏春秋》对待其他各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它是怎样在折衷主义旗子的掩护下，成为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的。

先看道家。儒家和道家都代表没落的贵族奴隶主，在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这一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方式上有区别。儒家讲“有为”，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新兴地主阶级扼杀于摇篮之中；道家讲“无为”，想搞“无为而无不为”，认为无声的包围和扼杀要更有效得多。儒家强调对地主阶级要积极进攻，道家主张采取消极退守的战术。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因而两者都主张倒退、复古。吕不韦为了篡政夺权，也利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²强调“君道无知无为”（《审分览·任数》），要求秦始皇做一个不学习、不问政治、光知吃饭睡觉的傀儡皇帝。他在《吕氏春秋》中叫嚣“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季春纪·圆道》），目的就是要秦始皇自愿让位给他这个“贤者”，以便他放手地在秦国进行复辟奴隶制度的活动。

再看阴阳家。《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大讲特讲五德终始，阴阳家的气味很浓。其实，这正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子思和孟轲面临着奴隶制彻底瓦解的战国时代，吸收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利用这种历史循环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倒退辩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哲学。但是，从此也就开始了秦汉时代儒生与方士的合流，出现了一批自称能见微知著的骗子。汉代董仲舒所创建的“天人合一”的谶纬神学，就是建立在所谓五德终始的理论基础上的。从子思、孟轲到董仲舒，《吕氏春秋》在这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它所鼓吹的什么“圣人上知千岁，

下知千岁”、“先知必审征表”(《持君览·观表》)等反动论点，就是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被政治骗子林彪所推崇的那套“见微而知著”的鬼把戏。

最后看法家和名家。它们在《吕氏春秋》中都是受攻击的对象。法家是吕不韦最主要的敌人，但由于秦国法家势力强大，《吕氏春秋》有时也被迫说几句假话，提出什么“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慎大览·察今》)。然而狡猾的是它空喊一阵，根本不谈变法的具体内容，而对法家的攻击却是具体而又恶毒，完全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骗子手法。名家强调“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尹文子·大道下》)。它是法家的同盟军，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但不如法家激进，带有调和、妥协的气味，旗帜不那么鲜明，影响也就远远不及法家。战国末期，名法合流，名归于法。《吕氏春秋》中对名家的攻击，实际上矛头是完全对准着法家的。

《吕氏春秋》是以儒家为主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它反映了奴隶主阶级中的各种集团面临着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威胁，结成了反动同盟。《吕氏春秋》在折衷主义破旗的掩护下，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武器，组织了一场对法家思想的反革命围剿，从各个方面向新兴地主阶级发动了进攻。它对于汉代以董仲舒为首所掀起的一股尊孔逆流有着重要的影响。汉朝儒家所整理成的《礼记》，其中的《月令》篇是割裂《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各篇拼凑而成的。汉朝儒家尊崇的《孝经》，和《吕氏春秋·孝行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吕氏春秋》开启了两汉儒家托古改制的先河。从孔丘、孟轲经过吕不韦到董仲舒，又经过韩愈到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组成了

一条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也是一条反对革新、坚持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

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例如苏修叛徒集团就是用折衷主义来掩盖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的。鼓吹折衷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这不仅是奴隶主阶级在覆灭前夕的表现，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上，当反动阶级在向革命阶级进攻的时候，它根本不讲折衷、调和，而是残酷镇压。但当革命阶级向它发动反攻的时候，它就大唱起折衷主义的调子，掩护退却，以便一朝卷土重来，好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林彪一伙极力宣扬的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哲学上说，它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把旧事物看成是神圣的、永恒的，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政治上说，就是维护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尖锐的革命斗争的面前，当机会主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假的总是假的。他们既要干反革命，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决不可能将真相完全掩盖起来。林彪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政治骗子，但最后还不是照样彻底垮台了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反动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折衷主义反动本质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吕不韦尊孔反法阴谋篡权复辟的失败

北京师范大学 施达青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奴隶主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靠搞政治投机，由一个大商人奴隶主，一跃而成为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窃取秦国大权以后，推行了一条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并把力图复辟奴隶制的儒家学派大量引进秦国，撰写《吕氏春秋》，为其复辟奴隶制大造舆论。《吕氏春秋》出笼后的第二年，以吕不韦、嫪毐为首的奴隶主旧势力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夺取秦国的最高权力，但立即被粉碎。由吕不韦等人挑起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继续。分析这场斗争的由来，剖析《吕氏春秋》尊孔反法的实质，可以使我们从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认清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吕不韦是奴隶主旧势力的政治代表

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开始向私田征税，公开承认土地的私有，承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合法地位。此后，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终于取代了奴隶制。到了战国末年，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全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反映了地主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愿望。

秦国是当时具有完成统一条件的唯一国家。自秦孝公任用商鞅以来，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商鞅在秦的变法，对奴隶制的打击较为彻底，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到秦始皇继位时，励行法家政治已经一百多年了，秦国已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荀子说过：“治之至也，秦类之矣”^②。就是说秦国的政治是最好的。而东方六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转化，但和奴隶制却保存着较多的联系，它们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儒家学派在这些国家大为活跃。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因而，由秦来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就在封建制已经普遍建立的这种情况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这场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六国政治势力，妄图改变秦国的政治路线这一问题上。当时，齐王派人到秦国游说，妄图离间秦国君臣，改变秦国的革新路线，进而瓦解秦国；燕太子丹收买了亡命徒荆轲潜入秦国谋刺秦王，妄想颠覆秦国，阻挡历史的前进。窃踞秦国丞相职务的卫国人奴隶主吕不韦，则用阴谋手段，妄图夺取秦国的最高权力，篡改秦的政治路线。这场惊心动魄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秦国的范围，实质上是不甘心灭亡的奴隶主阶级，与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奴隶主旧势力的猖狂反扑。